

延吉文史資料

第一輯

延吉政史會  
編輯

0709

# 序 言

沈在镒

《延吉文史资料》创刊辑，是我市悠久历史、峥嵘岁月的缩影，是我市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挣脱奴役，压迫锁链的历史见证，也是启迪今人惠及后人的珍贵教材。已故主席李先念同志曾经指出：“文史资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起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文史资料还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所以，编纂出版《延吉文史资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延吉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这里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是我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祖先们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向大自然拼争，索取；与敌对者殊死搏斗，反射出来的多彩多姿文化，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内容，亦为后人带来了许许多多、方方面面的有益启示。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尊重历史的，因为历史是连续的。它在过去中包含着现在，在现在中又孕育着未来；历史是百科全书，人们从中获得的是各种有益的启示，创造的又是新的

更加辉煌的历史。《延吉文史资料》就是我市各族人民历史足迹的真实写照。我们编纂此书旨在向社会提供真实再现我市各族人民历史足迹的精神产品，使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延吉的开发史和人民的斗争史，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促进民族团结和经济繁荣，为我市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延吉文史资料》创刊辑的出版，仅是开头，当然不可能猎及全面。热切地希望各族、各界人士和广大文史爱好者，广为利用这一园地，选择某一时间、某一方面、某一事件、某一人物，以丰富、准确、翔实的内容，撰文成稿、惠及本刊，使《延吉文史资料》不断丰富、充实，越办越好。

## 延吉文史资料第一辑目录

- 序言.....延吉市政协主席 沈在镒 ( 1 )
- 解放前延吉工商业及金融业的发展始末.....张泰显 ( 1 )
- 我在延边的回忆.....刘建璋 ( 21 )
- 难忘的战斗岁月.....李 挺 ( 25 )
- 记忆中的肖像——怀念振庭.....宫敏章 ( 39 )
- 海兰江血案.....李强虎 ( 58 )
- 延吉市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始末.....李强虎 ( 66 )
- 局子街爱国官兵抗击日本宪兵暴行的斗争...车成琶 ( 73 )
- 反日爱国志士姜兆霖.....张泰显 ( 84 )
- 延吉县第一女子初等小学校.....李无畏 ( 91 )
- 戚家磨坊发家史.....张泰显 ( 94 )
- 我所知道的延吉会源恒钱庄.....丁西元 ( 103 )
- 金成河的坎坷生涯与宗教生活.....金洪先 ( 106 )
- 延吉天主教会神甫刘裕庭.....张泰显 ( 114 )
- 王阿勺与延吉清真寺.....张泰显 ( 118 )
- 天主教在延边的传播.....赵 铁 ( 125 )
- 延吉武庙之回顾.....张泰显 ( 129 )
- 延吉插秧机厂(原拖拉机配件厂)的沿革...张泰显 ( 142 )
- 延吉居留民会和崔允周的罪行.....李宪虎 ( 153 )
- 间岛魔影——日寇在延吉(间岛)的  
特务统治.....史云谋 ( 159 )
- 罪恶的延吉妓女院.....张泰显 ( 174 )

# 解放前延吉工商业及金融业发展始末

张泰显

延吉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是延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经清朝、中华民国和伪满州国等不同历史时期。多年来经汉、朝、满、回等民族的努力开发建设，大片土地被开发，民族工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解放前延吉工商业比较落后，解放后百废待兴的民族工商业如同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大小工厂拔地而起，各式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当我们环视延吉鳞次栉比的工商业网点时，当我们瞻仰这雍容妩媚的市容和呼吸强烈的时代气息时，又怎能不爽心悦目，为之振奋。然而又怎能不回忆起延吉解放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艰难岁月。

## (一)

### 延吉早期工商业萌芽与发展概况

延吉俗称局子街，又名烟集岗。早在满清时期，这里到处是森林荒野，方圆数十里只有星星点点的人影炊烟。一八六九年朝鲜咸境南北道遭特大旱灾，大批朝鲜农民不顾封禁令越江移居到延边各地，随之延吉人口剧增。清政府设立的招垦局，让这些朝鲜农民和从直隶山东等地招来的汉族垦民一起开拓大量荒地。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中国政府下令东北的朝鲜人加入中国籍。这个时期延吉交通不便，百姓生活贫苦，食盐、布

匹及其它生活生产用品奇缺。随着延吉人口的增多，一些挑担走江湖的货郎及赶乡场的小商贩，搞山行的皮货商及药材商等先后流入延吉。当时延吉至吉林一带十分荒凉，来自吉林方面的日用杂货都要用行车和骡马驮子经数月的周折辗转才能运到延吉。老爷岭和张广才岭一带常有强人和土匪拦路抢劫，故有些行商常常是不惜重金雇用镖客押货而来。

约于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前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安徽等省的一些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先后接踵而至延吉，从而延吉才逐渐形成了定居的商业网点和简陋的手工业作坊。“万发祥”，“金聚成”两家小铁工所则是昔日局子街最早的工业萌芽。

商业店铺的出现大致可分为下列几个时期：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以后，延吉早期出现的商家字号约有十二家，其中有“永和兴”杂货店（由李秀山杨维汉经办）、“德顺成”杂货铺（经办人吴×谦）、“天增义”丝绸兼杂货店（经办人刘一山、张海波）、“吉顺和”布匹绸缎店（经办人张振德）、“福顺德”糖果食品兼售杂货铺（经办人卢广波）、“天顺成”食品杂货店（经办人杨信俞）、“仁 and 兴”杂货店（经办人不详）、“福盛德”日杂批发店（经办人卢万岭）、“福和盛”杂货店（经办人卢万山）、“广顺成”杂货店（经办人杨文超、杨子魁）、“春和永”杂货铺（经办人刘明斋），还有一家是由白俄罗斯人开设的叫“溜布林斯基”五金商店。由于这个时期延边是开发阶段，所以大多数商铺多半以经售铁锅、犁铧、火炉、糖果、各种山货、土制麻花布、少量丝织品以及其它有关生活用品为主，并且多半是合股集资经营，有的店铺股东竟多至五、六个。这些商

家字号一直延续到“八·一五”光复。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后,延吉的各类商铺门市越来越多,并先后出现了好多专卖商店,如棉布店、丝绸店、食品店、饭店、浴池等,平纹布、花旗布及其它部分洋货也开始流入延吉。这个时期出现的商家字号有“裕泰东”(温跃东经办)、“福盛东”(李锦杰经办)、“会盛兴”(陆跃臣经办)、“泰和隆”绸缎庄(刘志清经办)、“合计茶庄”(戚天庆经办)以及毕朝文兄弟所经办的“义发和”、“义顺和”两家食品糖果店铺等。上述商铺先是从吉林、营口、大连、沈阳等地进货,后来扩至天津、上海等地。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以后延吉又先后出现了新增和由原字号易名的许多店铺,它们是:“元发兴”、“天兴元”、“天顺福”、“福和成”、“通顺福”、“顺发和”食品商店、“花茂昌”五金商店、“庆祥福”香果食品店以及刘子衡经办的“稻香春”(原名“洪泰盛”)等杂货店。

一九三八年(康德七年)以后,延吉除有“永丰号”、“泰兴厚”、“居永久”等绸缎商铺出现外,洋铁铺、铁匠炉、皮铺、靴鞋铺、药店以及理发、照相、旅店等服务行业也相继发展起来。这个时期是解放前延吉工商业发展的极盛时期。大小商铺和各式手工业作坊约有二百多家。市场较繁荣,商品种类空前繁多,西洋货、日本货也大量充入延吉,平纹布、花旗布、斜纹布、卡叽布、直贡呢、各类丝织品、洋纱充满市场。当时延吉最繁华的街市有两处。一处是六十字街,(今市人大至东方剧场及北山小学南门外一带),这里买卖集中,商业繁盛,终日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另一处是商埠地(今延边医院东南一带),这里大小商铺有六、七

十家，饭店、钟表店、理发店、照相馆、妓院等多集于此。几乎是七十二行行行皆是，三教九流样样俱全，可谓盛矣。号称延吉的“小上海”，此时全市人口约有两万多。

在诸多店铺中，规模最大，资金雄厚颇有影响的算是创业最早的“吉顺和”布匹绸缎店了。该店经理张振德一向重视商业信息，讲究经商信誉，多年来抓住有利时机，多是采取先进货后汇款，商品赊销等手段，提倡薄利多销，资金周转迅速，生意极其兴隆。除“吉顺和”外，在商界名列前茅的还有“福顺德”面粉店，以及“广顺成”两家杂货铺。

“天顺成”经理杨信俞长期经销白糖、煤油及多种日用杂货。该店既搞批发，兼营零售，他们将成桶的煤油和整袋的白糖大批量地推销给许多大小商铺和外地的的小商小贩，该店拥资二万多元。老买卖“福顺德”的势头也不小，除经商外还有十余垧土地的吃租收入。

多年来，延吉的大多数商品一直是从营口、沈阳、天津等地进货，一般生活用品及土特产品则来自吉林。民国末期至日伪时期一些重要杂货及各种精光高档商品来自上海、杭州以及日本的东京和大坂。这些商品多是通过火轮从海上运往海参崴，再经过琿春转到延吉。当时的琿春几乎成了吉林东部的贸易集散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插足延边，花洋布、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腊（腊烛）、洋铁（铁皮）、洋钉子（铁钉）等各种洋货一时间占据了延吉市场，使民主工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一些日本东京、大坂和朝鲜、南洋等地的外商常常云集延吉，几乎年年都有大小商贾持货样前来延吉搭购订货。

早在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左右魏天春在“金聚成”



的基础上开办了以翻砂铸造业为主的“华兴铁工厂”，从此延吉当地自产的铁锅、犁铧、暖炉等开始上市。一九三六年（康德五年）以后，龙井的“东亚铁工厂”股东孙相德、林季馥等人来延开办了“东亚分厂”，经营各种机械加工，修理和简单的机械制造。“华兴”和“东亚”的出现，使延边地区的翻砂和机械制造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延吉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两个厂家的产品销往图们、百草沟、夏嘎河、三道沟乃至吉林地区。“华兴”后期所制的水井头（俗称洋井）曾一度与日本进口的争胜媲美，销路遍及整个东北。到一九三八年前后，伊家炉、万家炉、陆家炉、万发炉、小瓣炉、盛家油坊、赵家油坊、管家油坊、陈家油坊、金家油坊等作坊也先后相继出现。

当时延吉还出现了远近闻名的四家酱园，它们是王景堂的“德昌酱园”，韩红庆的“红庆酱园”，罗同兴的“同兴酱园”以及“东发涌酱园”等。其中以“红庆酱园”最负盛名（今延吉收容所址），储缸二百三十多口，其产出的大酱、酱油以及各种咸菜销往延边各地。

当时延吉出现的四家大药店有：“和发益药店”、“天兴德药店”、“全泰恒药店”、“关德厚药店”，此四家皆为河南人所办。

## （二）

### 烟酒专卖事业的发展

烟酒专卖业在延吉工商业发展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延边最早出现的工业，实际上是酿酒工业。延边建厂最早、规模最大的酒厂则是王泽普在东盛涌的“同泰源”大烧

锅，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拥有劳金（工人）近二百人，日产白酒一千二百多斤，它在吉林东部久有盛名。“同泰源”在延吉设有“会升源”酒局，掌柜的姜兆霖是一个经商家，经办期间信誉最高，酒味醇酏，飘香千里。其次是朝阳川的“广兴源”烧锅、太平沟的“聚盛涌”、延吉的“祥发园”、“恒泰福”以及后期的“姜家烧锅”等皆先后相继酿酒，并都在延吉设有专卖酒局。这些烧锅的酒，虽然都是土法酿制，但大多以高粱、玉米为主要原料，醇香味厚，驰名东北三省。

“启动烟草公司”（民国时期称“英美烟草公司”，日伪时期叫“启东烟草公司”）是延边著名的烟草公司。其经营的烟业遍及吉林全省乃至牡丹江、佳木斯一带。该公司销烟量最大，品式多样，主要的卷烟品种有“炮台王”、“大前门”、“哈德门”、“兰刀”、“粉刀”及“苦力烟”等。这些烟多用出彩形式销售，每盒烟内分别装有大马、小兔、电影明星画片及象牙烟嘴等小巧玲珑的彩物。其中“大前门”烟盒中所装彩物最精美，烟草公司以此诱惑买主，因而销路甚广。延吉后起的“南洋烟草公司”也是如此，这两家烟草公司完全垄断并控制了延边地区的烟草市场。

### （三）

#### 当铺和钱庄的出现及日本帝国主义金融界的垄断

在地主资本家当道的旧社会和在日本帝国主义践踏蹂躏下的延边，人民生活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多数城市贫民和农民常因饥寒或天灾人祸急需用钱，有人就用此可乘之机牟取暴利，大捞一把。

延吉于民国后期就出现了专门收取抵押品和放高利贷的店铺，这就是常常使人不能自拔以至倾家荡产的“当铺”。当时延吉有六家“当铺”。许多饥贫者因生活所迫常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将自己最珍贵的物品低价押给当铺，以解燃眉之急，借款的多少是由抵押品的估价而定，押期为半年、一年、二年或三年不等。如果到期不赎回，抵押品全归属当铺高价出售给别人。所以当铺则是紧勒穷人致命的绳索，并且多为有权势之人所经办。“当铺”中规模最大财势最雄厚的是“福兴当”，其经办人鞠福臣是延吉第五任商务会长，有钱有势，而“大升当”的经理马甫泉是当时“三省银行”的行长，“福合成当铺”经理毕守先（字长会）则是连任四届的商务会副会长，当然也是财势两旺了。至于“永兴当”、“永衡当”、“吉兴当”，规模虽次于前三者，但其经办人的社会地位也绝非一般。这些开当铺的金融资本家，其勒索财物的手段十分残酷阴险，如一件新上衣原价五元。可押给当铺只合二、三元，而且利息又非常高昂，许多穷苦之人押借当款根本无力按期抵还。当铺对金银手饰、钟表、皮货、丝织品及其它高档商品的压价更为厉害，从而牟取暴利，大发横财。当时的“福兴当”是日日当户盈门，楼上楼下排有近三千个号头，拥资四万多元。据说，鞠福臣借给陆跃臣一万元巨资开办的“会盛兴”杂货店，全部是“福兴”当铺的盈利。

在军阀混战，烈强瓜分下的旧中国，货币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远的不说，仅在延吉市面上就流通有十余种货币。由于各种货币价值不平衡，流通范围有限，于是就出现了由私人经办的存款、放贷汇兑为主要业务的金融商店叫

“钱庄”。当时延吉通行的货币有中国通钱（铜币，一个铜币值十张纸币）、有现大洋（袁大头）、现小洋（有孙中山头像），还有金融、羌（镗）贴（苏俄币）中交票、奉票、哈大洋、吉林省的永衡官贴、永衡官洋（永衡小洋）等等。个别大财主还出制购票，因其财势大，故拿他家的“购票”照样可以兑换其它货币。在上述诸货币中各地也都以现大洋（袁大头）为本币进行互兑。民国十一年前后，延吉相继出现了五、六家大小钱庄。其中名气最大的是王子权的“会源恒”钱庄，郭子久的“同昌合”钱庄，高佩行的“大有”钱庄等。这些钱庄是天天在耍钱，时时在骗人，一天一个行市，他们是专门靠兑换各种货币获取暴利而发家致富的。兑换时要按当天市面牌价，如有人要去哈尔滨，手中只有吉林永衡官贴，就必须到钱庄兑换哈大洋或羌（镗）贴，去沈阳则兑换奉票。在兑换中兑者明明有一元的货币价值，而钱庄只以八角作价同其它货币兑换。如果必须用现大洋（袁大头）时，钱庄更要勒索百分之二十的货币价值，换者无奈，宁可赔也要兑换，否则出门时将寸步难行。当时在延吉“会源恒”钱庄最大，资金丰厚，有大小八个股东投资，拥资约八千六百多元。

民国年间还有一种特殊的金银锭货币叫“元宝”。分金质、银质两种。金元宝有五两重的，银元宝则为五十两，皆由北洋造币厂发行。要用大钱去外地，因不便找零或携带不便，就要用元宝兑换现大洋。试以银元宝兑换现大洋为例，实则 是以银兑银，按平等价格，一个银元宝应接近七十个现大洋（现大洋每个重七钱二分），而钱庄只付给五十六个，从中捞取四两白银。反过来，要买钱庄的一个银元宝，那就必

付八十个现大洋。正因为钱庄如此有利可图，所以各地的车站都设有兑钱部门，延吉后期的商务会也专设了一个兑换货币的专室，北京天合银行的延吉分行也专门给来延边的各地商人兑换货币。一九三〇年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渗入，这些钱庄及后期出现的“永字钱铺”、“发字钱铺”相继破产倒闭。

民国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渗入龙井，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日本在龙井设立领事馆，并先后在龙井开设信义、山田、茂利、茂久、坡田等日本洋行。日俄战争以后，日帝又将其魔爪伸向延吉，在延吉建立上述洋行分行。他们大力批销烟酒、“洋布”、“洋面”、“洋油”及各种海产品，并主动向华商赊销。这样天长日久就致使有的厂家或店铺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吞并。信义洋行和后起的昌瑞洋行。特别是朝鲜银行和东拓株式会社（东洋拓殖会社）等更是当时民族工商业的死敌。他们以高利贷形式向广大农民发放有息贷款，许多贫苦农民债台高筑，无力偿还，最后只能将自己辛勤开垦的土地全部押给洋行而背井离乡，有些工商业者因为饮鸩止渴而最后倒闭。

朝鲜银行（日本人经营的银行）对延边的掠夺甚烈，他们竟公然地宣称在延边以金票（日币）为主要流通货币，一切商品交换均以金票为准。这种侵犯我国金融市场主权的行为实在令人愤慨。当时全国通用、信誉最高的袁大头（现大洋）其一元价值才合金票八角多。“九·一八”以后，日本金票就逐渐成为东北三省通用的货币了。

货币的混乱，日币的上市，造成了人心的荒乱。随着日货及其它外国货物流入延吉，一九四〇年以后的日伪政权对

各类商品实行统购封销政策，从而使延边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致使好多商店和厂家纷纷破产。

#### (四)

##### 商务会的成立及其早期的反日斗争

商务会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封建组织形式，具有较强的排外性和保守性，它主要是为了保护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权宜，因此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小店铺、厂家都主动地加入了这个组织。凡被选为商务会长的人，多是为人正派处事公道，久经商场，富有声望的人或那些资金雄厚并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殷实户。当时的商务会长是商界和街坊的当权人物，有时直接与地方政府发生联系，有些人正直正诉，替工商界说话，主持公道，却也有些人常与警察、宪兵、特务勾勾搭搭，作威作福。

延吉的商务会，于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成立。当时叫“酒商会”，最早入会的有三十多家，以后逐渐增多。

延吉商务会第一任会长（约一九二三~一九三〇年）是东盛涌“同泰源”烧锅驻延吉的“会升源”酒局经理姜兆霖。“福合成”当铺经理毕守先任副会长。王百谦担任文督（也叫佐办），邱少轩为调查员。办公厅设于商会街（今朝阳房产管理所路东址），一九二七年改为商务会，商务会还设秘书、会计、办事员等共七人。会长任期为三年，因姜兆霖主持正义，富有众望，因而连任三届会长。

姜兆霖是延边反日兴学开拓人之一关俊彦（《民生报》社长，解放后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一任专员）的好朋友，是当时在政界的知名人士，也是延边工商界一致推崇的社会

活动家，是一位有威望的反满抗日志士。他为人正直，富有经商才干，遇事主持公道、见义勇为，具有民族气节。任职期间，他常公开出面说情，释放被官方无理拘捕的无辜农民。日伪时期，他积极宣传反满抗日思想，抵制日货侵入，有时竟当众责骂那些给日本人做事的人是走狗。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大陆政策，准备着手修筑吉会铁路（从吉林至敦化、朝阳川、龙井、渡图们江至朝鲜的会宁）。收买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时大肆贿赂地方官吏和土豪劣绅，梦想将吉会铁路分段修筑，以便及早地把延边的大量森林、矿山资源运往本国，但因多次遭到延边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一直未能动工。一九二二年初，日本又派人将一些有名望的地主豪绅及各界知名人士请到吉林共商会晤。会上，日本人大摆酒宴，并用重金赏赐与会者，以诱使诸人在天图路（天宝山至图们）认定书上签字画押。参加会议的姜兆霖、关俊彦、曹梦久等三人坚决拒绝签字，并当即急返延吉发表了反日筑路演讲，揭露程亚楷、吴少白、吴左臣等亲日派出卖民族利益欣然签字的无耻行径。在延吉商务会、农会、教育会的影响下，延边师范师生及全市各界人士游行示威，并捣毁了程亚楷、吴左臣等人的家庭住宅。龙井、琿春、和龙、汪清四县也纷纷响应，成立“反日护路联合会”进一步开展斗争。姜兆霖同关俊彦、刘鹏玲、曹梦久等人做为延边各界群众代表，奔赴吉林、奉天、南京请愿，很快得到了省内外各界人士的声援。在东北三省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使吉会铁路天图段的施工终于延期。

继姜兆霖之后第二任商务会长（约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二年）是亲日派吴佐臣、副会长仍是毕守先（“福合成”经

理），王百谦改当秘书，并另设两名董事，由董事主持日常事务。商务会在延吉各街头巷尾设置路灯（当时用煤油马灯照明）。吴佐臣是一个地主兼资本家，是有名的绅士老爷，他出资开设了“天兴德”药店（张秉臣任经理），龙井也有买卖，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延吉商务会第三任会长（约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四年）是“永丰号”经理殷俊卿，毕守先为副会长，其下属人员也有变动。此时的商会组织规模更大，组建了救火队，用以防火防盗，还备有土制的消防车。又成立了商团组织，白天操练习武，夜间巡逻放哨，身着灰色制服，有简陋的土枪，约有三、五十人。这些人多是由各大商铺雇用而来，任务是保护城市及各商家、厂家的安全，防范土匪进城抢劫等。

第四任商务会长（约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年）是三省银行行长马甫泉（字文清），副会长是“广顺成”杂货店经理杨文超。这一时期的商务会完全由日本董事高野××控制，马甫泉实际上是傀儡会长。

第五任商务会长（约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是延吉资金最雄厚、势力最盛的“福升当”经理鞠福臣。毕守先又任副会长，邱少轩为商务秘书。

第六任商务会长（约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五年）是延吉街街公所所长刘鹏玲（字梦久），一个日本人任商务会佐办。

一九四五年延边解放，刘鹏玲当了延吉维持会会长，其他许多绅士也加入了维持会。一九四六年以后该组织全部解散。



## (五)

### 商人的发家术和商界的竞争

“小康出于勤奋，大富由于天凑”这完全是旧社会掩盖剥削阶级剥削行为的谎言。其实“为仁不富，为富不仁”才是一切地主、资本家发家的绝巧。在那样的世道，哪一个地主没有一本恶贯满盈的剥削史，哪一个资本家没有一个损人利己的发家术、竞争史。

#### 1. 资金的来源

通过剥削、走私、投机等手段，对劳动人民进行直接的或间接的掠夺，是多数资本家积累资金的主要渠道。地主兼资本家戚洪祥之所以能开设磨坊、茶庄，拥有房屋一百多间，土地一百二十多垧，完全是靠压榨农民，投机走私，放高利贷等手段成为暴发户的。地主从农民手中剥削来的金钱流入城市转化为商业资本，是多数商业者初期的资金来源之一。

“泰和隆”杂货铺、“天一方”饭店的财东孙荣铭的资金及其家私的来源更是不光彩，孙的老辈结交了匪首孙楼，并为其窝藏了许多不义之财。当孙楼率众匪去盘石抢劫时被官军全歼，于是许多私藏的不义之财便成了孙荣铭发家创业的资金。孙荣铭以此为本，放高利贷，种植罂粟，残酷剥削佃户。拥有黄牛一千二百多头，房屋三百六十多间，亦农亦商，经办杂货铺和饭店，还在佳木斯开设“德发东”铁工厂等，其资金的积累无一不是来自对劳动人民的直接和间接的掠夺。

#### 2. 熟知商情，重视信息